

禮樂無錫

主編 楊衛澤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禮樂無錫

李嵐清題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礼乐无锡/杨卫泽编.——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9.1

ISBN 978-7-5399-3083-1

I. 礼… II. 杨… III. 音乐史—无锡市—文集 IV.
J609.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206269号

- | | |
|------|---|
| 书 名 | 礼乐无锡 |
| 封面题字 | 李岚清 |
| 编 者 | 杨卫泽 |
| 责任编辑 | 杨倩 |
| 责任校对 | 易青 |
| 责任监制 | 卞宁坚 江伟明 |
| 出版发行 |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
| 集团网址 |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
| 照 排 | 南京新华丰制版有限公司 |
| 印 刷 | 无锡市广新印刷厂 |
| 经 销 |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
| 开 本 | 787 x 1092 毫米 1/16 |
| 字 数 | 350 千 |
| 印 张 | 22.5 |
| 插 页 | 7 |
| 版 次 | 2009年1月第1版, 2009年1月第1次印刷 |
| 标准书号 | ISBN 978-7-5399-3083-1 |
| 定 价 | 115.00元 |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序

无锡，一座承载着3200年文化底蕴的历史名城。清丽刚健、兼容博大的吴文化从这里发源壮大，尚德务实、崇礼爱乐的优秀传统在这里传承弘扬。书声之朗，琴声之幽，曲调之美，礼仪之盛，无不体现这方水土的灵秀和人民的聪慧。

无锡，人文荟萃，特别是近现代各个领域中大家辈出，如星河横空，珠耀大地。就音乐一界而言，民族音乐大师华彦钧（阿炳），以一曲《二泉映月》感动了世界，成为千古绝唱；着力融会东西方音乐之长、弘扬国乐的刘天华，又以《良宵》、《光明行》，抒发了一个时代民众的心声情怀；此外，民族音乐理论开山鼻祖杨荫浏，南鼓王朱勤甫，二胡演奏家周少梅、储师竹、闵惠芬、邓建栋，钢琴家顾圣婴，声乐教育家张权，作曲家王莘，指挥家曹鹏、聂中明，吴歌大王钱阿福……犹如青山排闼层层迭，太湖潮涌波澜卷，谱写出中国音乐史上光辉的篇章。

我常常在想，无锡人才的涌现，有时代特定的背景，也有千年形成的良好的人文环境。“礼”和“乐”成为渴求文化、提高素养的无锡人必不可少的自修课程。孔子授“六艺”，就是用文化的甘霖濡染人的心灵，培养人的情操，“六艺于一治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义。”西周时学校教育内容就包括礼（礼仪制度、道德规范）、乐（音乐、诗歌、舞蹈）、射（射箭）、御（驾车）、书（文字读写）、数（算法）（《周礼·地官·保氏》）。先贤们正是用“礼”、“乐”来提升人的道德和情操。堪称我国历史上最早的音乐评论家季札，就是无锡人。他不仅德行高尚，而且在音乐上有独到的见地，闻乐而感知国家的兴衰，观舞而察觉民情之清浊。有了这样一位礼乐修养高品贤人发端，无锡的礼乐之脉便如江河浩荡，气象万千。

“礼”行于表，“乐”发于心，礼乐修养是孕育培养人才的基础，心之追求和谐美好，行之必遵德行完备。一首好的乐曲甚至会成为历史进步的动力、时代前进的号角、民族精神的火炬。曾记得国家遭侮、民族沦亡的抗日时期，《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等优秀乐曲，激发多少热血青年的爱国热情，奔赴疆场。新中国成立后，无锡籍著名作曲家王莘创作的《歌唱祖国》唱遍了北国南疆，成为站起来的中国人民自豪的心声，五十多年过去了，人们依旧传唱那激情燃烧的岁月。由此可见，贴近时代，贴近群众，贴近生活的作品，具有永葆青春的生命活力。

无锡拥有道教音乐、江南丝竹、十番锣鼓、锡剧音乐、吴歌、民间说唱等丰富的音乐文化遗产，也拥有众多为弘扬中国民族音乐呕心沥血作出贡献的音乐名人。我们以极其敬畏的虔诚态度，对待这笔不可多得的财富，立志将其弘扬光大，成为无锡建设“文化名城”，构建和谐社会的不竭动力。有感于此，我们组织有关人士梳理无锡礼乐历史的文脉，发掘整理自古至今，无锡籍音乐文化名人的生平、事迹和对音乐事业的卓越贡献，编纂成书。希望更多的中外朋友了解无锡文化，同时也让子孙后代感知礼乐于人生修养的重要作用。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工作，欣然为此作序。

礼乐是无锡一张亮丽的名片。当朋友打开我们递上的这张名片时，看到无锡山美水美，礼仪周全，又听到《二泉映月》优美乐曲时，是何等的温馨和惊喜！

杨卫泽

中共江苏省委常委、无锡市委书记

2008年11月15日

目 录

前 言 ·····	吴祖强 1
概 述 ·····	3
季 札：礼乐教化的典范 ·····	32
华秋蘋：鹅湖秋水采蘋人 ·····	45
吴畹卿：近代民间音乐的贤达 ·····	55
郑觐文：音乐大同的追梦人 ·····	69
周少梅：虞舜薰风 丝竹名家 ·····	83
刘半农：叫我如何不想他 ·····	91
阿 炳：名垂乐史千古存 ·····	108
刘天华：民族音乐的革新者 ·····	124
杨荫浏：为音乐的一生 ·····	139
储师竹：传薪续火 继往开来 ·····	152
朱勤甫：打击乐的一代宗师 ·····	161
顾毓琇：文理兼通 师表天下 ·····	173
刘北茂：秉承兄志 改进国乐 ·····	185
曹安和：音乐相伴 谦和一生 ·····	199

阿 甲：当代戏曲理论家 · · · · ·	207
蒋风之：善于用乐器说话的演奏家、教育家 · · · ·	217
卫仲乐：播扬国乐 雄风长存 · · · · ·	226
钱阿福与朱海容：再续吴歌 · · · · ·	234
吉联抗：音乐史海洋中的采珠人 · · · · ·	247
钱仁康：博学多才 学贯中西 · · · · ·	254
王 莘：用一生歌唱祖国 · · · · ·	263
张 权：水净沙明 乐和西中 · · · · ·	273
黎松寿：让人不约而同敬仰的人 · · · · ·	280
曹 鹏：普及交响乐的功臣 · · · · ·	287
聂中明：最富感染力的合唱指挥 · · · · ·	296
顾圣婴：天生的肖邦作品演奏家 · · · · ·	306
闵惠芬：用二胡唱出“音诗” 用生命创作“心曲” · ·	315
王子初：音乐界的实干家 · · · · ·	322
王建民：让民族音乐新生 · · · · ·	329
邓建栋：从阿炳家乡走来的二胡演奏家 · · · · ·	336
后 记 · · · · ·	蒋伟坚 343
附 录 · · · · ·	吴祖强 344

前言

35年前，为了让中国的交响乐团增加一些具有民族色彩的乐曲，也为了给外国的乐团能提供一些便于演奏的中国作品，我将著名的民间盲艺人阿炳（华彦钧）的二胡独奏曲《二泉映月》改编为弦乐队合奏曲。虽然由于当时极不正常的政治环境，《二泉映月》弦乐合奏的演出历经磨难，但却使我与阿炳、与他的家乡，太湖水畔的无锡结下了不解之缘。10年之后，为纪念阿炳90岁的诞辰，我又接着弦乐合奏《二泉映月》的思路，改编了他的另一首二胡独奏曲《听松》，将这两首情绪迥异的乐曲合为一组在纪念音乐会上演奏。改编曲受到了乐队演奏者和听众的欢迎和喜爱，这又更加深了我与阿炳及其家乡无锡的情谊。

无锡，倚山傍湖，通江达海，“水性使人雄，山性使人实”，其特殊的地理条件，形成了地方通达、务实的文化特点。地灵则涌出人杰：唐朝宰相李绅；明代旅行家徐霞客；近代史上的“刘氏三杰”刘半农、刘天华、刘北茂兄弟；现代的文学大家钱穆、钱锺书……也都出生于有“太湖明珠”之称的无锡。

提起无锡的音乐家，人们大概都会想到阿炳。但又有谁知道，从春秋战国时期的季札，到近代民间音乐的贤达之士吴畹卿；从百科全书式的音乐学者杨荫浏，到一生以弘扬民族音乐为己任的卫仲乐；从让人们不约而同敬仰的民族音乐家黎松寿，到打击乐的一代宗师朱勤甫……这些先哲，都在中国音乐史这幅绵长的锦卷上挥洒下了绚烂的篇章。可以说，丰富的乐音唱响了源远流长的吴文化，并推动、促进了无锡文化的繁荣，也为这太湖明珠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适值盲音乐家阿炳诞辰115周年之际，欣闻在岚清同志和无锡市委的关注下，《礼乐无锡》得以付梓出版。这本书通过翔实的史料，生

动的语言，不仅使人们了解太湖之美，也使人们理解了山水与音乐、山水与音乐家们那不能分离的关系。

“盛世修史”，无锡市连年来在经济建设上取得的成就，已然有目共睹。同此时刻，着眼于文化建设，更让大家欣喜相看。即使《礼乐无锡》一书洋洋廿五万言，在中国文化史浩瀚汪洋中只是沧海一粟，但此书以地方音乐人物志之形式编写，不但向大家展示了该地对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继承与发展的贡献，更为重要的是，《礼乐无锡》的出版，应该能够启发全国多处对编纂地方志典籍（尤其是艺文志）的重视，其意义之深远，自是毋庸赘言。

《礼乐无锡》编辑委员会邀我作前言，我确实深感荣幸与惶惑同在，提笔勉为其难，只不过是借此表达些许内心对无锡及其礼乐成就的敬意。



中国音乐家协会名誉主席

2008年11月18日

概述

无锡市位于长江三角洲江湖间走廊，江苏省东南部。东邻苏州，距上海128公里；南濒太湖，与浙江省交界；西接常州，去南京183公里；北临长江，与泰州市所辖的靖江市隔江相望。无锡市为江苏省省辖市，全市总面积4650平方公里，行政区现辖6个市辖区和江阴、宜兴两个县级市，为全国15个经济中心城市之一。

礼乐无锡的源起

无锡是吴文化的发源地之一，是中国古代礼乐制度在江南实施最早的地区。新中国成立以来，依据文物考古事业的成果，无锡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六七千年前的远古时代。骆驼墩、仙蠡墩、高城墩、彭祖墩等考古重大发现，为确立太湖流域古文化的发展序列提供了依据。无锡先民的原始文化先后属于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和马桥文化，他们以自己的智慧和辛勤劳动，创造和丰富了太湖流域辉煌的远古文明。

吴文化与太伯奔吴

在吴文化的早期，良渚文化居于十分重要的位置。1999年在无锡江阴市石庄镇出土的高城墩良渚文化遗址，被评为当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首。截至2000年1月20日发掘结束时，共发掘面积近1000平方米，大规模的、有严谨布局规划和严格的建筑方法建筑的高台墓地，计有13座大、中型良渚文化中、晚期墓葬，出土文物233件（组）。高城墩发掘出土的玉琮有5件，遗址被破坏期间收集到2件，属于良渚文化中期，一毫米内刻有数条纹线，软玉硬似金属，刻工令人惊奇，以造型奇特精巧、寓意神秘而著称于世。良渚人生活时期，制玉业是重要的手工业，良渚文化也因为其玉器的精美而达到了中国史前玉文化的高峰。良渚文化出土的鼎、豆、盂，以及斧、铙等生产生活用品表明，距今4000年前的太湖地区，已有较为发达的农业。长江史前文化在民生方面，稻作

文明、蚕丝起源、苎麻织品、生漆利用，皆早于黄河流域。良渚文化在太湖地区延续时间长达1200年左右，对于早期吴文化的形成至关重要。

继良渚文化之后是马桥文化。其年代为夏商时期，地域包括环太湖地区，以及今上海、苏东南和浙北，内含一定成分的黄河流域二里头文化及早商文化因素。研究表明，两者之间有过相当程度的交流，从客观上讲，大概与中原地区战争频繁而引起人口大规模的迁徙有关。马桥文化时期江阴余城遗址的发现，使我们看到这种用土堆的高台古城虽与北方的城墙筑法不一样，但同时又为我们了解太湖地区夏商时期古城的建筑方法提供了新的材料。

商朝末年（公元前10世纪），西周太王长子泰伯偕弟仲雍，史称为避王位南奔，定居江南，筑城建都于梅里平墟（现锡山市梅村），自号“勾吴”。泰伯将中原先进的文化带到吴地，并有机地融入到古老的文化之中，在开拓中发展，在发展中壮大。

20世纪70年代以来，陕西省周原考古队在岐山与扶风之间，发现了周长60里的都邑遗址及西周早期宫室大型建筑遗址，证明这一时期周人已建立了较为完整的政治制度（包括礼制）和相对严密的社会组织，尤其是嫡长制的存在。《史记·吴太伯世家》载：

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季历果立，是为王季，而昌为文王。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勾吴。荆蛮之义，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

泰伯奔吴对无锡早期社会带来两个方面的巨大变化，一为传播宗周正在发展的礼乐制度；一为带来黄河流域的生产技术，带动无锡地区奴隶社会的经济开发。

《孔丛子》称：“文子曰：‘吴越之俗，无礼而亦治，何也？’孔子曰：‘夫吴越之俗，男女无别，同厕而浴，民轻相犯。故其刑重而不胜，由无礼也。中

国之教，为外内以别男女，异器服以殊等类。故民笃而法，其刑轻而胜，由有礼也。’”在炎热的南方，尤其是夏季，人们衣着袒露得多一些完全可能。至于文身，其内涵比较复杂，但最基本的是含有某种当地特定的象征意义。所以泰伯、仲雍来到吴地以后，入乡随俗“断发文身”。进入文明时代的中国，其衣着服饰内含礼制因素。所以《礼记》称：“夫礼者，所以章疑别微……故贵贱有等，衣服有别。朝廷有位，则民有所让。”按照礼制的规定，天子、百姓各有服饰，而且在什么场合穿什么衣服，都有严格的限制，用以区分高下贵贱，维护权威。泰伯自号勾吴后，针对当地原有的风俗状况，再依据中原及个人的政治观念，进行了礼制渗透。《左传·哀公七年》记载，孔子的学生子贡到吴国，对吴大臣伯嚭说起吴先世时称“太伯端委，以治周礼”。《潜夫论·志氏姓》载：“太伯吴君，端垂衣裳，以治周礼。”《周礼·春官·司服》称：“期其衣服有玄端素端。”郑玄注曰：“端者，取其正也。”邢昺疏曰：“其衣正幅，染之玄色，故曰玄端。”端又作布之长度单位。这里关于泰伯端垂衣裳的记载说明两个意思：一是端正服饰以示其正，二是用布帛丝麻替代兽皮进入文明时尚。更为重要的是“端垂”，为礼制的重要表现，只有在礼制的范畴内，着不同的衣裳才能显现出其身份的高下贵贱。

《论衡·谴告篇》载：“太伯教吴冠带，孰与随从其俗与之俱裸也？故吴之知礼义也，太伯改其俗也。”移风易俗，是礼制教化的重要内容，其功能正如司马迁在《史记·乐书》中所讲，是“助流政教”。

泰伯是宗周太王古公长子，曾参与制定早期周礼，十分清楚兴文治礼的重要性，深知“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记·祭礼》）。他自号勾吴以后，以礼教化当地社会，以义安抚尚未开化的吴人，最终获得了拥戴，站稳了脚跟。

泰伯奔吴，有史家认为是宗周灭商的一步战略部署。从实力上讲，泰伯因让王出走，不可能随征很多兵力，强取不足以征服吴人之心；从形势上讲，商纣王暴虐已引起世人公愤，泰伯参与灭商计划，决不会走殷商统治的老路，必然用一套新的思路教化吴人，换取民心，从而达到管理吴人的目的。另外吴人之俗“民轻相犯，故其刑重而不胜，由无礼也”，与中原地区“其刑轻而

胜，由有礼也”（《孔丛子·刑论第四》）大不相同。再加上吴地人民好勇善斗，“轻死易发”（《汉书·地理志》）及“信鬼神，好淫祀，父子或异居”等（《隋书·地理志》），泰伯敏锐地看出这一治理的关键，采用“以治周礼”的措施，使“荆蛮归之，号曰勾吴”（《汉书·地理志》），开创了吴国礼乐之风。

泰伯给无锡当地文化作出的另一大贡献，就是将黄河流域先进的生产技术带进吴地，为当地生产力水平的发展注入了新活力，史称数年之间人民殷富。

泰伯未来吴地以前，当地以农渔经济为主，尤以稻作见长，但却不足以养家。史书记“吴地以船为家，以鱼为食”（《汉书·五行志》）。泰伯建立勾吴后，利用水乡丰富的资源发展农业。他率领民众大兴水利建设，开凿了我国最早的一条人工运河——泰伯渎。泰伯渎又称为伯渎，“西起运河，东达蠡湖，贯景云、梅里、垂庆、泰伯四乡，长八十七里，广十有二丈”（宗菊如、周解清《中国太湖史》），即起今无锡南长街清名桥，西至漕河（《泰伯梅里志·山水》）。这条人工运河的开凿，极大地便利了农田灌溉，又发展了交通运输，后人称“水旱无虞，百姓利之”（《太平寰宇记》卷九十二）。与此同时，又传授给吴人中原先进的农业和铸冶生产技术，发展农业和铸造业生产。此外，还率领吴人修筑城池，结束以船为家的飘泊生活，转向亦渔亦农的定居生活。1954年在丹徒烟墩山出土的宜侯矢簋，与同时期陕西张家坡出土的方格乳钉圆涡夔纹簋，及陕西岐山贺家村出土的史臣舌簋等，器型及纹饰都大体相当（王世民、陈公柔、张长寿《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进而，铸造业又带动了兵器的发展，后来名震诸国的“吴钩”，正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勾吴地区早期的礼乐文化是宗周礼乐制度和吴地早期原始礼乐风俗的平稳结合，一不是国家的强制推行，二不是外力的武装侵入。这种结合，促成了具有容易吸收外部先进文化的吴文化特质的形成，也使吴地礼乐文化较全国其他地区早先成形。

西周礼乐与儒学

公元前11世纪，周灭商，至公元前771年迁都，是为中国历史上的西周时期。周代建国初，开国武王姬发死后，其子年幼的成王继位，武王的弟弟姬旦即周公辅政。周公在“分邦建国”的基础上“制礼作乐”，总结、继承、完善并系统地建立了一整套有关“礼乐”的治国制度，把原有宗周的礼乐文化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周礼》所涉及之内容极为丰富。凡天下九州，天文历象，邦国建制，政法文教，礼乐兵刑，赋税度支，膳食衣饰，寝庙车马，农商医卜，工艺制作，各种名物、典章、制度，无所不包。其中最重要的是嫡长子继承制和贵贱等级制。周礼把其他庶子分封为诸侯卿大夫，与天子是地方与中央、小宗与大宗的关系。周公旦还制定了一系列严格的君臣、父子、兄弟、亲疏、尊卑、贵贱的礼仪制度，以调整中央和地方、王侯与臣民的关系，加强中央政权的统治，将宗周的礼乐文化发展成管理强大国家的政治制度。

周公所制定的“礼”，是维护统治者等级制度的政治准则、道德规范和各项规章制度的总称，后来发展为区分贵贱尊卑的等级教条。“乐”则是配合各级贵族进行礼仪活动而制作的舞乐。舞乐的规模，必须同享受的级别保持一致。西周的礼乐制度，形成了西周特色的礼乐文化与礼乐文明，对后来历代中国文化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礼乐治国”的方针导致礼乐从神坛走向世俗人间。周人把原本用来礼序神鬼的礼乐扩展到礼序人伦，把礼乐从虚幻的神鬼世界延伸到现实的人际关系中。西周礼乐制度在保留事神礼仪的同时，扩展了礼仪的事项，扩充了礼仪的内容，使社会的政治关系、等级秩序、道德伦理、思想感情等内容都体现为礼节仪项，使礼仪充斥于意识形态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周灭商后，因太伯无子，周武王追封仲雍的五世孙周章为吴君，建吴国。从太伯至阖闾共二十四世，前后600多年，无锡梅里一直是吴国的都城。太伯、仲雍及其后世诸王，在继承太伯推行的礼乐基础上实行周礼，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吴文化逐渐成形，这就是黄河文化、长江文化和礼乐文化的结合。无锡礼乐的早期形态进入周礼推行时，既比较容易接受，又没有特别严格的执行。

据《吴太伯世家》记载：泰伯十九世孙寿梦有子四人，长子诸樊，次子馀祭，再次子馀昧，四子季札。季札贤德，且多才多艺。吴王寿梦在传位时，意欲立季札，但季札推辞不受，于是立长子诸樊。后来寿梦死后，诸樊又让位于季札，季札依旧推辞。再后，“吴人固立季札……季札弃室而耕，乃舍之”。季札三让王位与泰伯之三让同出一辙，所以后人并称其为大贤。但是，其意义与泰伯截然相反。泰伯让王，是长让幼，嫡让次，是在宗周的礼乐文化发展期；而季札的让王，是幼让长，次让嫡，是在西周礼制的成熟期。季札的贤是维护西周礼乐制度之贤。

春秋时期，吴国在勾吴的基础上生产力有了很大发展，政治上、军事上也日益强大。据《吴越春秋·吴泰伯传》记载，自从周人泰伯、仲雍等从内地来到江南以后，使“地广人稀”、“无冻饿之人，也无千金之家”的江南大地，“数年之间，民人殷富”。由此，吴国国力大增，在阖闾做吴王期间终于击败了越国的勾践和邻近的君主国，登上霸主之位。据史书记载，阖闾用贤任能，积极进行社会改革，发展经济，振军经武，是一个胸怀大志、才能出众的霸主。在先秦时代的吴国，出现了许多杰出的人才，如有一定谋略的伍子胥，《孙子兵法》的作者孙武等等。

位于无锡市新区鸿山镇的鸿山遗址是春秋战国时期长江下游吴越文化的墓葬类遗址，因其具有珍贵的历史文化价值，被评为“2004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并于2006年5月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已发掘的7座墓葬出土文物达2300余件，其中玉飞凤精致称奇，还有大批出土陶器、礼器等，规模宏大、等级尊贵、器物精美，为吴越地区所罕见。建国以来，在无锡北周巷发现的春秋早期的铜器窖藏中出土的青铜器，反映了吴国青铜工艺的高超技艺和艺术特色。此外，宜兴吾桥、无锡华利湾、江阴大松墩等地都有春秋时期墓葬和遗址的发现，各地出土的几何印纹陶器、原始瓷器等，造型奇特，纹饰纤丽，表现出浓厚的江南地方色彩，充分反映了吴国社会发展的水平。

周公制礼作乐，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调。这套制度之所以为后世所称道，因为它是以道德为核心而建立起来的，由此确立了道德在治国理念中的主

导地位，这对于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西周礼乐制度不过是文化领域内的一次社会实践，真正将这种制度理论化，使之成为一种思想体系而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的，是东周（即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

儒学是由孔子开创的中国最古老、悠久、博大，而且最富影响力的思想学派。这个学派诞生于“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是上古以来礼乐文化的集大成者。

孔子真正成为儒学和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是他生活的春秋末叶社会变革时代造就了他。儒学不仅传承了巫史以来的文化，而且把西周的礼乐制度、源自上古并存留于当世的社会习俗，提取、转化为自觉的思想意识；既依守传统，又创发新知，更将此二者熔为一炉，建构起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

孔子从“泰伯让王”起，对西周的礼乐加以继承、弘扬和改造。“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歌功泰伯”，把原来僵硬的强制规定，提升为生活的自觉理念，把一种宗教性神秘性的东西变成为人情日用之常，从而使伦理、规范与心理欲求融为一体。孔子极其推崇泰伯的功德，在《论语》中，专有一篇《泰伯》。他说：“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论语·泰伯篇》）并且，孔子由“亲”及人，由亲亲而仁民，既推崇现存的等级秩序，又强调某种“博爱”的人道关系，这使其思想具有一定的原始人道主义意义。从这种思想出发，儒家学者通过对三代社会理想化的追慕，阐发其“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社会主张。从孔子开始，儒家非常重视礼乐。他们写了很多书记载阐述古代的礼乐制度，并且自己也研究礼乐，用它来进行教育，形成了中国礼乐文化的完整体系。

中国古代教育内容有“六艺”，就是“礼、乐、射、御、书、数”，礼乐列在“六艺”的前两位。儒家将“六艺”改编为《诗》、《书》、《礼》、《乐》、《易》、《春秋》，礼乐是其中重要的内容。《礼记·乐记》中说：“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中国古代的礼乐文化经过春秋乱世，从周礼到儒学，成为管理国家的思想体系和社会运行的规范，推崇德治、仁政，“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讲究礼

仪、重视德行、强调修养，“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蒞，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论语·泰伯篇》）追求社会生活的既有秩序又有活力。

如果说原始礼乐是服务于神鬼，西周礼乐是服务于政治，那么，儒学则要礼乐服务于社会，要使礼乐深入人心，起到促进伦理道德的作用。不仅要使礼乐成为维护宗法制度、维持等级秩序的一种政治工具，而且也希望礼乐成为建立崇高人格、促进社会和谐的一种教育手段。孔子所说的“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孝经·广要道》），集中反映了他对礼乐的社会功能的认识和重视。

“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胜则流，礼胜则离。合情饰貌者，礼乐之事也。”这种思想，甚至对后世中国传统音乐的形态特征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儒家又把礼乐作为处理统治和被统治阶级关系的润滑剂，主张将原是贵族统治阶层享用的礼乐普及到庶民中去，提出“与民同乐”（孟子）和“所与民同”（《礼记·乐记》），强调“礼节民心，乐和民性”，还希望使全社会之“亲疏、贵贱、长幼、男女之理皆形见于乐”。儒学把纯作为祭祀的“乐”延伸到社会的治理和生活中，使民间的音乐得以扎根生长。通过提倡礼乐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两方面应具有的社会作用，儒家的理想主义者进而将礼乐推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赞美道：“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礼记·乐记》）

鸿山遗址中出土的大批江南地区所罕见的种类齐全、成套成组的陶制打击乐器，见证了无锡2500多年前礼乐文化的兴盛。无锡音乐史的源头，可以一直追溯到春秋时期仲雍十九世孙季札，史称其为吴地最早的音乐评论家。

礼乐制度将世俗化的礼仪和规范化的音乐人为地结合在一起，并使二者固定化、模式化，从而进一步扼杀了音乐作为一种艺术的独立品性。由于周代礼乐制度和儒家礼乐思想受到后世历代王朝的标榜推崇，致使经过先秦扩大和强化的音乐实用功能成为中国音乐史上起主导作用的一种价值取向。同时，也为无锡地区特色礼乐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培育了土壤和环境。